

《楞严》真伪与《大唐舍利塔之碑》考辨

尚永琪

《大唐舍利塔之碑》，1987年4月10日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陈家庄的一唐代舍利塔地宫内^①。碑为泥质灰陶，通高49厘米，由碑首、碑身、碑趺组成。碑首高12厘米，宽20厘米，六螭盘顶成拱形，上镌篆书“大唐舍利塔之碑”七个字。碑身高28厘米，宽15.7厘米，厚6厘米，上镌楷书19行，分镌于正面、一侧面、背面，计254字。现将碑文标点移录于下：

窃闻大雄猛建威震万方，动达三轮，影透尘沙之刹，系持法鼓，吼列娑婆，湛寂皎而圆明，正辨虚融之海莹摩尼体，照落三禅，结集龙华，示现涅槃之积。今有遗形舍利，建塔镇于唐邽川，此伽蓝所奉天宝。

圣文神武皇帝是以今轮定国，远播天门，戍夷乏戟，莫由我。皇王有感月爱，再弘，皆是我大师道成秘莹《楞严》精藏，常持舍利广演禅。河凝定水而通光，喜贺纲漫之相；金峰预楼，瑞应喜巢。大法之源，辨意三乘，混合无为之道；契真冥应三昧虚玄菩提，大宗勿恻其虔。今已坚身增万，可表幽玄。镌碑会文，勒名传记。

天宝六载岁次丁亥二月丁未十五日辛酉永安寺比丘
海印敬造

出家弟子 真净

修文弟子 宝意树

镌碑弟子 宝意林

碑中说的“圣文神武皇帝”，即唐玄宗李隆基。《旧唐书》载：玄宗于开元二十七年（739）加尊号为“圣文神武皇帝”。塔碑刻造时间为唐天宝六年（747），此时正是唐玄宗登基继武周统治而达到的盛世时期。原清理报告认为这塔碑是“皇权与佛教势力相互利用的实物见证”，仅仅将它视为一块一般的佛教碑，而忽视了它对中国佛教史的特殊意义。我们认为，该碑是唐代玄宗天宝年间奉持《楞严经》的佛教徒所刻，碑文分两部分：第一部分讲“大雄猛”的成道涅槃历程，亦即舍利塔修建的缘起；第二部分歌颂唐玄宗的文治武功，并向“大宗”阐述了其教旨。碑文的内容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佛教史上长达一千多年的《楞严经》的真伪之争及相关诸问题。

为了论述问题的方便，在考释碑文之前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关于《楞严经》真伪之争的来龙去脉。

《楞严经》，全称是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》，是唐代中叶译出的一部大乘佛教经典。从唐代目录学家智升撰的《续古今译经图记》和《开元释教录》著录始，历代大藏经都收录了此经，将其归入大乘秘密部。但是《楞严经》所包含的内容，事实上却涵盖了几乎全部大乘概念，不纯粹是密教内容。它的内容的庞杂，使之在中国佛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^②
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部经典，在它译成汉文后不久，即产生了其是伪经的说法，并在学界争论达千年之久。据智升记载，《楞严经》于唐中宗神龙元年（705）在广州译出，译成汉文后不久即传入日本，引起日本僧界的纷争，后派德清法师等到中国考察，从唐居士法祥口中得知：“大佛顶经是房融伪造，非真佛经也，智升未详，谬编正录。”^③另一位日本僧人戒明在唐代宗大历年间

(766—779)入唐求法时也曾听到《楞严经》是伪经的议论。这些记载都来自日本僧人的听闻，唐人著作中不见《楞严经》是伪经的记载。近代学者梁启超也认为《楞严》是一部伪经，吕澂先生更是从多方面提出关于《楞严》为伪的一百零一条证据。^④近年又有学者从释藏版本目录学的角度比勘论证，认为《楞严经》不是一部译自梵文的经典，而是唐代僧人怀迪所撰。^⑤这是目前关于《楞严经》真伪之争的总体情况。

出于奉持《楞严经》的唐代僧人海印等人之手的《大唐舍利塔之碑》，其建造年代（747）离智升所记《楞严》译出时间（705）仅差42年，而离《开元释教录》成书时间（730）也仅差17年，所以它正弥补了典籍记载模糊的缺憾，为我们认识《楞严经》的成书情况提供了可靠的材料。

对于碑文的考释，一般佛典涉及的普通概念我们就不一一诠释了，而只选其中的主体部分，即反映《楞严》所独有的思想的部分作一考释：

1. “皆是我大师道成秘莹《楞严》精藏”

在佛学论著中，“楞严”一词单独使用时，即为《楞严经》的简称。此句中的“楞严”一词是中心词，“秘莹”为其修饰限定语，可解为“秘密净好”；“藏”是佛道二教对其典籍的总称，“精藏”即“宝藏”，是对中心词进行补充说明，所以此处的“楞严”一词不是一个佛经概念术语，而是对经典《楞严经》的简称，是“藏”。

碑文中的“秘莹”二字值得我们重视，它作为“楞严精藏”的修饰限定词，指出《楞严》是一部秘密部经典，这与佛经目录的分类及其产生背景相合。智升《续古今译经图记》云：“以神龙元年龙集乙巳五月卯朔二十三日辛丑遂于灌顶部中诵出一品，名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》一部，十卷。”此处的“灌顶部诵出”与“秘莹《楞严》精藏”互证，可知唐代佛

经目录家将《楞严经》归入大乘秘密部是有根据的，也就是说，当时奉持《楞严经》的佛教徒自己认为《楞严经》是“秘莹”——秘密部典籍。就从《楞严经》产生情况来看，它无论是译自梵文还是唐人撰作，其产生都是以密教经典的大量传入为背景的。所以虽然它内容庞杂，却自跻身于密部典籍之列以获得大乘的承认，以求发展，是十分合情理的。

2. “湛寂皎而圆明”

这句是碑文第一部分的主旨。《楞严经》云：“诸根非一非六，但于圆湛黏发见闻”，将妙圆明心六根性法说为一体，不同其他经典。《楞严经》又云：“已灭生灭，而于寂灭，精妙未圆”，以生灭与寂灭相形，认为有已灭生灭寂灭未圆的境界，这是《楞严》所独有。碑文中的“皎”即“明”、“光”，是相对于“圆明”来讲的，是“皎”而未圆之境。“皎”即“精妙未圆”，此正是《楞严》修持进境的独特之处，大乘诸经无此一境。如《涅槃》：“灭生灭已，即应寂灭”，就没有“未圆”一说。佛学大家吕澂在《楞严百伪》中也认为有“未圆”之境为《楞严》为伪的一证。

3. “河凝定水而通光，喜贺纲漫之相”

大乘其他诸宗的五根五力修为渐次为信、进、念、定、慧。3世纪编译的《法华经》中，认为由此岸世界过渡到彼岸世界的六类途径——即“六度”为：布施，持戒，忍辱，精进，禅定和智慧，讲“引入佛慧”，是先定而后慧，外道、凡天、小乘及权教菩萨皆各有定，但非究竟，因其所依定体皆非真实心。而《楞严经》则讲三一圆融之定，是“示真实定”，认为不舍生灭迷心，终不能修如来真实大定，是先慧而后定，讲定是究竟。碑文的“河凝定水而通光”正是直指“定”而“通光”，讲定是究竟，即《楞严》所谓“吸持圆光，成就教体”^⑥是也。

4. “大法之源，辨意三乘，混合无为之道；契真冥应三昧虚玄菩提”

此句是碑文的中心，修碑者解释了他们的教旨——“大法之源”，并且重点说明他们的“大法之源”是“混合”了三乘的，并且所修证的是大乘的“菩提”。

先说“三乘”，三乘即声闻乘、菩萨乘和缘觉乘，大乘即菩萨乘。将“三乘归一”的代表经典是《法华经》，它是站在大乘佛教的立场，调和佛教内部各派最具代表性的经典，它认为在它之前的声闻乘及其后的缘觉乘同出诸佛之口，所谓“二乘”、“三乘”之说，究竟是“唯一佛乘”。碑文中讲的“契真冥应三昧虚玄菩提”，翻译过来就是说它所证的究竟是“暗合（冥应）三昧虚玄菩提”的，这从反面说明了它不是大乘其他诸宗，因为大乘是证菩提而不是“冥应”菩提。这也说明它同当时大乘各宗确实存在差别。关于“无为之道”，小乘有“三无为”，大乘有“六无为”，碑文认为其“大法之源”混合了无为之道，这也与《楞严经》的实际情况相合，《楞严经》几乎包含了大小乘的所有概念，它作为一部晚出的大乘经典，具有兼容并蓄的思想特点，它既有《华严经》十方诸佛，万法唯心的思想，又有《般若经》诸法性空的思想，还有《法华经》诸法实相，《涅槃经》的佛性说等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，以及律仪、禅定、诵咒等种种涉及净土和密教的内容。所以碑文云“辨意三乘，混合无为之道”，就很容易理解了。其他各宗、各经典是不讲这种“混合”三乘的。《法华经》讲“唯一佛乘”，它宣扬的“三乘归一”也是站在修菩萨行的立场上而言的，而不是“辨意三乘”。

5. “大宗勿侧其虔”

这句是紧跟上一句的，但因其含义深远，故单独提出加以考辨。碑文在讲完“大法之源”后又加上“大宗勿侧其虔”一句，反映了明显的底气不足，有些“信不信由你”的意味。就是说，镌碑僧人是担心大宗“侧其虔”的；或者说“大宗”已经“侧其虔”，他们不得不解释一番，向“大宗”表明他们的“大法之源”

是与大宗相一致的，是“冥应”的。联系上文来看，此处的“大宗”指大乘各宗派。我们也可联系下文“今已坚身增万，可表幽玄”推论：当时的大乘各宗（包括密宗）至少是怀疑《楞严经》的合法地位的，奉持该经的佛教徒对自己经典的地位也是信心不足，所以在修舍利塔时，还要向“大宗”表白一番。

6. “圣文神武皇帝是以今轮定国……皇王有感月爱，再弘”

此句引人注目的是“再弘”二字，我认为，“再弘”二字是相对于唐玄宗对密教经典的传人的支持而言的。正纯密教传入中国始于玄宗开元年间，善无畏、金刚智先后于开元四年（716）、开元八年（719）抵达长安、洛阳，受到唐玄宗亲自召见，并在唐朝政府的支持下，相继译出《大日经》等经，弘扬密教。开元二十九年（741）金刚智在洛阳广福寺病化，其弟子不空奉其遗命，于天宝元年（742）从广州动身去印度请取密教经典的梵本，在师子国请到十八会的《金刚顶经》及其他五百余部梵本密教典籍，于天宝五年（746）返回唐朝，受到玄宗的无上优待，敕令他住在鸿胪寺，并请他到皇宫内设道场，唐玄宗还跟不空受密宗灌顶。此碑文先盛赞玄宗文治武功，继而又说“皇王有感月爱，再弘”，就是指不空归唐后受到玄宗支持，继承善无畏、金刚智遗业，“再弘”密教。这在时间上是相吻合的，该碑作于天宝六年（747），正是不空归唐后一年。这也与碑文中的“秘莹楞严精藏”及佛经目录将楞严经归入大乘秘密部互证，说明当时奉持《楞严经》的佛教徒认为《楞严经》是一部密教经典。

从以上考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：

《楞严经》是随密教典籍的传入而出现的一部经典，它的主体是大乘思想。由于它晚出，是“混合”三乘，“冥应”菩提的，这就使它同当时的大乘其他经典有别。它包含的密教内容，一方面是由于兼收并蓄所致，一方面也是为了借密教经典的传入而扩大其影响。所以当时的大乘诸宗（包括密宗）是怀疑甚至不承认

《楞严经》的合法地位的。《楞严经》的问题也正就出在这儿，它没有梵文原本，杂收各宗经典的思想而又比附于秘密部经典以图张大，那么它的产生肯定是有问题的。近年学者提出的“怀迪伪造说”不是没有道理的，而《大唐舍利塔之碑》的发现，正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，故不揣浅陋，略作小考，以求抛砖引玉。

注：

①莎柳：《甘肃天水市发现唐代永安寺舍利塔地宫》载于《考古与文物》1992.3，第65页。

②李富华：《关于〈楞严经〉的几个问题》载《世界宗教研究》1996.3。

③见《大乘三论大义钞》载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第七十五册。

④《吕澂佛学论著选集》卷一，第370页，齐鲁书社，1986年版。

⑤罗炤：《〈契丹藏〉与〈开宝藏〉之差异》载《文物》1993.8。

⑥智旭：《大佛顶首楞严经文句》十卷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吉林省社会科学院《社会科学战线》杂志社